國家發展研究　第八卷第二期
2009 年 6 月　　頁 89-114

在韓國的中國政治之研究現狀考察

李在光*

收稿日期：2008 年 10 月 13 日　　接受日期：2009 年 3 月 23 日

* 大韓民國仁荷大學校東洋語文學部中語中文學科教授，大韓民國中國學研究會會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　要

本文運用文獻考察法和比較研究法對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情況進行了考察。在簡要回顧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歷史的基礎上，本文從中國政治研究的研究人員、研究環境、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四個層面勾勒出了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現狀全景圖。同時，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科定位問題、韓國研究視角的缺失問題、不同學科間有名無實的共同研究問題、以及資料共用問題都是目前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存在的亟待改進的問題。因此，本文建議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們能保持清醒的問題意識，從比較具有實現可行性的方面入手，如實現一定程度的資料共用和加強學術組織交流等方面開始努力，爲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進一步發展做出貢獻。

關鍵詞：韓國、中國政治研究、現狀、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序言

無論從地理上、軍事上、文化上，還是歷史上來看，中國一直都是作爲韓國的近鄰和能夠對韓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國家之一而存在的。自然，在韓國的歷史上，對中國，尤其是對於能夠鮮明體現其治國方針和戰略的政治思想之研究也一直是韓國學界非常重視的一個領域。從以前韓國主要進行的“漢學”研究中作爲重點的孔子、孟子、朱子思想，到近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變化、銜接貫通關係等，一直都是國外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學者們所關注的主題，自然韓國學者們也對此進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並取得了相應的成就。

“韓國的中國政治（包含外交）研究已經具有不短的歷史了，特別是一九九二年韓中建交以後，研究人才急劇增多，研究成果也隨之大量出現”[1]，在韓國，中國政治研究出現了一片繁榮景象。從把中國作爲韓國近鄰，即作爲區域學中的一個重要國家來進行正式研究的七〇年代開始，有關中國政治研究的出版物、碩博士論文，以及一般學術期刊刊載的論文大量湧現。這些研究成果中所討論的主題也突破了以往的中國傳統思想等主題，更多地體現出了與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發展同步，對中國政治動態進行實況研究分析的特色。

本文主要運用文獻考察法、比較研究方法對韓國有關中國政治之研究情況進行了整理分析，通過對在韓國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人員、環境、成果、方法等的梳理，勾勒出了一幅韓國迄今爲止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全方位圖景。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分析了目前韓國國內在中國政治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和爭論點，並初步探尋了用以

1 鄭在浩等，“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再考察：以資料、方法論以及談論爲中心”，《國際政治論叢》，第 45 輯第 2 號，200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改善目前研究狀況的幾條建議，以求能對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進一步向前發展貢獻微薄之力。

貳、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之歷史

在韓國，雖然對中國的政治思想之研究由來已久，但是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之前，基本上都處於一種傳統維持狀態，沒有什麼大的發展。直至九〇年代，尤其是一九九二年韓中正式建交以來，在中國內部政治改革、韓國社會的變化，以及兩國關係等的影響下，在韓國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回顧歷史，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四個時期。

一、第一時期：二戰以後到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

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研究主要依附於“漢學”的研究領域之中。當時學界普遍認爲，“‘漢學’就是先進文化”[2]，因此在包含了中國的文學、史學以及哲學的漢學研究中，政治思想是作爲哲學思想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其研究主題也主要是中國傳統的孔孟思想等，沒有其他更多的內容。

二、第二時期：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末

隨著一九七二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中美正式建交，一九七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及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周恩來和毛澤東的相繼離世，中國的政權掌握在了宣導改革的鄧小平手中。這期間，韓國關於中國的政治研究進入了一個相對比較活躍的時期。這一時

[2] 임규섭，“韓國的中國研究的昨天和今天 — 中國研究者的苦悶和反省”，《亞太研究》，第 14 卷，第 2 號，2007 年 11 月 3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雖然對於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也仍然在進行著，但是更令人注目的變化是出現了將中國政治作爲一種特殊的政治體制來進行研究的趨勢，即把中國作爲“共產圈”中的一個典型代表，與蘇聯一起進行研究。這也是中國開始作爲區域學的一部分被韓國學界認可並對之進行研究的開始。

三、第三時期：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到九〇年代末

這一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績。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中國政府在政治方面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再加上一九九二年韓中兩國的正式建交，很多對中國進行研究的學者能有機會親自到中國去進行實地考察，在資料的取得方面有了顯著的進步。這一時期對中國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文、史、哲等領域，出現了更多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緊密相聯繫的研究成果，如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政治的變化情況等等。當然，這期間，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也仍然處於韓國的中國研究中的主要地位。可以說，這一時期是一個轉換期。從臺灣留學歸來的學者和從中國大陸留學歸來的學者都日漸增多，再加上前一個時期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居於主要地位的美國留學歸來學者們，韓國對於中國的整體研究水準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

四、第四時期：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末到現在

這一時期韓國與中國的交流大幅度擴大，到中國進行旅遊或考察的普通韓國人日漸增多，因此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民眾，對於中國的認識也較以往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而且，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僅是將中國看作一個研究物件進行研究的，更是把中國看作對韓國產生重大影響的“韓國生活中的一部分”[3] 來進行的。隨著二〇〇七年中國

3 임규섭，“韓國的中國研究的昨天和今天 — 中國研究者的苦悶和反省”，《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躍成爲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對象國，中國任何政治政策的變化都將對韓國的經濟、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對中國政治動態進行跟蹤研究自然不得不成爲韓國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期間，關於中國政治研究的學會以及學術期刊等也相繼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參、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之現狀分析

基本上正式起步於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的中國政治研究目前在韓國可以說正處於蓬勃發展時期。以下我們將從研究人員、研究環境、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式四個角度來對當前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情況進行考察。

一、中國政治之研究人員層面

根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統計，到一九九九年爲止，韓國有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 89 人。而“截至二〇〇五年，據中國政治研究所、韓國國際政治學會、以及中國政治研究會、現代中國學會的記載，韓國現有中國政治研究者 124 人左右，大部分爲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到現在爲止取得學位的 30 歲到 40 歲左右的學者們。”[4]

(一) 代際劃分

儘管其實並不存在非常嚴格而準確的劃分標準，在韓國還是存在著對學者們進行代際分析的習慣。從更大的中國學研究的角度上來看，韓國的中國學者大致可以分爲四代。第一代爲二十世紀七〇年代

太研究》，第 14 卷，第 2 號，2007 年 11 月 30 日。

4 金道喜，“韓國的中國研究：視角和論點”，《東亞研究》，第 50 輯，2006 年 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期開始進行研究的學者們；第二代爲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從臺灣畢業並開始進行研究的學者們；第三代爲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期從中國大陸畢業並開始進行研究的學者們；第四代則是二〇〇〇年以後開始研究生涯的學者們。其中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學者的情況與整體稍有出入，即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者基本不存在第二代，其他代際都與中國學研究的代際劃分類似。

(二) 學位取得地分析

對於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者進行分析的第二個角度爲學位取得國家或地區。當然，也有學者認爲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角度。與其研究學者的學位取得地，不如更多地關注學者自身的研究領域更加具有現實意義。但是無論一個學者的研究領域是什麼，作爲一個單獨的個體來講，他或她求學地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風氣一定會對其日後的研究方式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正是基於這些考慮，筆者還是對學者的學位取得地進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藉以進一步釐清韓國目前進行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的情況。

首先，佔據最大比例，且曾經對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打下基礎的當屬美國留學歸來的研究人員。這些人作爲韓國中國政治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大部分是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歸國的。此外，還有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歸國的第三代留美研究人員。第三代留美學者們雖然比第一代晚了將近二十年，但是其學術思想、研究方法、思考方式等基本上繼承了第一代的傳統，沒有什麼新的突破之處。但是正是這些學者歸國以後，將自己學習到的知識介紹傳播到韓國來，由此奠定了韓國最早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基礎。這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學者們具有較強的英文閱讀能力，並在美國受到了嚴格的方法論訓練，比起在國內和其他地方取得學位的學者來說，其理論性更爲嚴格，學術研究也表現出非常嚴謹的特點。但是他們的弱點在於，幾乎不接觸第一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文資料，也沒有到中國去進行過現場考察，因此難免會出現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的問題。

其次，臺灣留學歸來的人數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大量增加。這部分學者們在臺灣接受濃厚的中國傳統學派教育，而且一直大量使用中文資料進行學習研究，因此與於美國學習的研究者相比，其研究的現實性更強一些，而且大都具有非常深厚的漢學功底，這將有助於今後的研究。但是，與在美國取得學位的學者們相比，在臺灣學習的學者在理論系統性以及方法論上都顯然處於劣勢。此外，由於中國大陸和臺灣在意識形態上處於敵對狀態，臺灣的學界也受到“反共”思想的影響，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

第三，從中國大陸留學歸來的研究人員從一九九六年以後到現在一直呈持續上升之勢。相比之下，從其他國家畢業的人數則相對大量減少。在中國大陸學習研究的學者們，相對來說，具有身在中國、能夠利用中國第一手資料的優越性，但是由於中國大陸屬於社會主義制度，在資料搜集及利用方面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封閉性和限制性的特點，反倒不如在臺灣方便。而且，在中國大陸學習的學者們也自然而然地體現出很大程度上憑藉“中國政府官方檔”[5] 的研究傾向。這樣看來，雖然韓國近年來有偏好中國現場研究出身的傾向，但是大陸留學出身的學者在研究時的客觀性也同樣存在一定的問題。

第四，韓國國內畢業的學者也佔據著一定比例，但是整體來看處於非常微弱的地位，且一直在減少。據調查，在九〇年代初到二〇〇五年爲止取得學位的 30～40 歲的研究中國政治的 51 名學者中，“英美圈 11 人，國內 11 人，臺灣 3 人，中國大陸 26 人。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以後取得學位的學者中，英美圈 5 人，韓國國內 2 人，臺灣 2 人，中國大陸 20 人。由此可知，韓國國內出身的研究者顯著減少，中國

5　김영진，“試論中國政治研究的定位問題”，《國際區域研究》，2003 年 1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陸出身的研究者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6]

二、中國政治之研究環境層面

除了從研究者的角度進行分析以外，研究者所處的研究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者的研究活動。這種研究環境包括外在的硬環境和學術上的軟環境。所謂硬環境主要是指研究時所需要的研究費情況、研究所的建立及營運情況、學術期刊的營運情況等。而軟環境則主要指涉在政治研究方面的整體研究風氣、氛圍等。

(一) 研究費情況

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開始，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不但政府對相關研究的研究費投入不斷擴大，連企業和民間研究所也大幅增加了對中國研究的研究費支出。從一九九四年起，韓國政府就增設了資助區域研究的研究費，並將該研究費的管理工作交給首爾大學負責，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移交給韓國學術振興財團進行掌管。該研究費原用於補助各大學的教授進行區域研究及優秀的博士生寫博士論文時到國外進行研究調查。到一九九九年，政府的研究費支援情況又發生了變化。以前的營運方式全部取消，代之以新的形式，意即對大學老師而言，可以以單獨研究和共同研究兩種形式來申請研究費；而對優秀博士生支付的海外研究調查費則歸併到以前就有的“新進人員研究獎勵金”系統中。此後，對中國進行研究的學者們申請研究費就變得日益艱難起來。但是從二〇〇二年開始，韓國又興起了對中國進行研究的熱潮，所以進行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們又得以得到較多的研究費用來進行研究。

---

[6] 金道喜，“韓國的中國研究：視角和論點”，《東亞研究》，第 50 輯，2006 年 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政治研究者主要從統一部、外交通商部、外交安保研究院、世宗研究所、高句麗財團等部門或機關取得研究費。且取得研究費之後的研究成果多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現。

(二) 研究機關情況

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之間，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研究所大多是以大學附屬研究機關的形式，以對共產主義思想進行研究而存在的。從八〇年代末到韓中建交，隨著對中國研究熱情的高漲，進行中國研究的研究所，性質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一段的中國政治研究不再停留在過去的“共產圈”研究，而轉變爲國策研究，即成爲了事實上的“國策研究所”。

但是，目前韓國國內的研究所情況也不容樂觀。儘管數量不算少，但是研究人員的確保問題和穩定問題都皆爲現存之明顯問題。很多研究人員都把研究所工作作爲進入大學當老師前的一個過渡階段，所以並沒有長期的研究計畫。這直接影響到了研究所的長期發展。而且，目前韓國的中國研究所的硬體配置也不太令人滿意。很多研究所都沒有自己的研究資料室，研究所很多處於名不相符的狀態中。目前，主要的研究院所包括世宗研究所、外交安保研究院等。其他附屬于大學的研究所大部分規模比較小，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漢陽大學的中蘇研究所和韓國外國語大學的中國研究所。

(三) 學術期刊的運營情況

目前在韓國刊登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刊物越來越多。除了原來的專門性的政治性刊物，發展到現在作爲區域研究一部分的中國學的很多刊物。但是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漢陽大學中蘇研究所發行的《中蘇研究》、由韓國政治學會發行的《韓國政治學會報》、以及由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發行的《國際政治論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以這三種刊物爲例，考察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所刊登之論文數量以及主題領域等，即可略見其在中國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

表 1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國政治領域論文分類表[7]

時　期	1990～1994			1995～1999			總計
期刊 / 主題	《韓國政治學學報》	《國際政治論叢》	《中蘇研究》	《韓國政治學學報》	《國際政治論叢》	《中蘇研究》	
研究方法	0	0	1	0	0	0	1
政勢分析	0	0	0	0	0	1	1
一般政策	3	0	33	1	2	2	11
政治制度	0	0	7	1	2	6	16
政治理念	0	2	3	1	0	0	6
政治過程	1	1	6	6	4	6	24
政治變動	0	0	1	0	0	0	1
政治文化	0	0	8	2	0	4	14
對外關係	0	2	2	1	0	8	13
總　計	4	5	31	12	8	27	87

三、中國政治之研究成果層面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特別是韓中建交以後，作爲地域學的一部分，韓國的中國學蓬勃發展起來，其中中國政治研究又是研究的重點之所在。隨著研究熱情的高漲，研究資料的取得方面也有了顯著進展。除了公開發表的書籍、論文，地方的地方誌，甚至在實地考察時一些內部資料也都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得到，這就進一步爲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這樣的背景下，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成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以下就此進行簡要分析。

7　鄭在浩等，《中國政治研究論：領域、爭論點、方法以及交流』，首爾：NANAM 出版社，2000，頁 2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 量的角度

目前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現爲幾種形式，即單行本、學術研討會資料、學位（碩博士）論文、以及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詳細情況見表 2 及表 3。

表 2　一九九〇年前後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成果對照分析一覽表[8]

種類 / 年度	1990 年前		1991～2008/4/28		合計（迄今爲止）
	數　量	百　分　比	數　量	百　分　比	
單行本	138	28%	352	72%	490
研討會資料	0	0%	11	100%	11
學位論文	27	15%	159	85%	186
學術期刊論文	334	36%	585	64%	919
合計	499	31%	1,107	69%	1,606

從表 2 中可以發現，在一九九〇年前，各種形式的研究成果占截至二〇〇八年四月研究成果總量的 31%，而一九九〇年以後之比重則占 69%，一九九〇年以後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取得了迅速的發展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一九九〇年前，韓國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爲發表者學術期刊上的論文，而在一九九〇年以後，以中國政治爲主題的學位論文顯著增加，而且各種以中國政治爲討論主題的研討會也開始舉行。

8　該表爲筆者依據韓國國會圖書館電子圖書館，以“中國政治”爲核心詞檢索所得數據製成，檢索日期爲 2008 年 4 月 2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一九九〇年後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成果發展變化情況一覽表[9]

種類＼年度		1990～1994		1995～1999		2000～2004		2005～2008/4/28		合計(1990～2008/4)	
單行本		66		97		110		79		352	
研討會資料		1		2		7		1		11	
學位論文	碩士	23	32	42	46	42	49	26	32	133	159
	博士	9		4		7		6		26	
學術期刊論文		147		165		193		80		585	
合計		246		310		359		192		1,107	

表 3 則顯示了一九九〇年以後在韓國快速發展中的中國政治研究在量方面的成果。一九九〇年以後，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整體上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該表從一九九〇年開始，將每五年作爲一個小的時間單位來統計每五年所出現的研究成果。最後一個時期是從二〇〇八年開始到現在，即二〇〇八年四月。資料顯示，一九九〇年以後，每五年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成果都在持續穩定增長。

(二) 質的角度

與量的考察相比，質的考察標準不易確定，所以對於質的考察相對比較困難。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是以研究主題的擴大來作爲考察質的考察基準的。根據전성흔和이민자的研究，現在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主題主要表現爲以下幾個方面，即分權化、中央與地方政治、地方政治過程、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社會分化。這些研究主題隨著中國國內政治發展而不斷變化。當然，研究主題的擴大確實也可以算作是質方面發展進

9　該表依據韓國會圖書館電子圖書館檢索所得數據製成，檢索日期爲 2008 年 4 月 2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步的一個衡量方式。

此外，從研究成果來看，單行本原來大多以概論形式出現，用於大學教科書。現在則陸續出現一些對特定具體主題進行深度研究的單行本。與過去相比，質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從學術期刊的角度而言，比較優秀的學術期刊也是一個考察方向。現在在韓國國內，關於中國政治的學術期刊非常多，但是比較得到公認的能夠作爲體現高品質研究成果的學術期刊是《韓國政治學報》、《國際政治論叢》、《中蘇研究》。這幾個學術期刊審稿標準比較嚴格，而且是專門的政治類期刊，所刊載的論文水準相對較高。從學位論文的角度講，其研究範圍突破了以往對於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研究主題緊跟中國當前政治的延伸主題，體現出更多時事性的趨勢，也是品質慢慢進步的一些標誌。

從引用資料方面來看，韓語資料的被引用數呈持續上升之勢。考查歷年來發表在具典型代表意義的《韓國政治學會報》和《中蘇研究》上有關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所引用之語種，以前的學者大多依賴中文資料，而現在出現了更多使用韓語資料的趨勢。我們不能說更多引用韓語資料就能等於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在質方面有了提高，但起碼這種現象可以從側面證明近年來可供引用的韓語資料比過去增加許多。而且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以後的韓語資料引用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二〇〇〇年以前，韓語資料的的引用數幾乎爲零，而二〇〇〇年以後，該數字上升了很多，具體數值可參考表 4。從中不難看出二〇〇〇年以後韓國國內學者在中國政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此外，從研究方式上來看，過去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主要以個人研究的方式來進行；從九〇年代後期，共同研究的研究項目開始出現，雖然，其中不少專案只是爲了得到研究費而在研究計畫書上表現爲共同研究，實際上僅爲分別各自作業而已；二〇〇〇年以後，在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學術振興財團的後援下，一些研究人員解除了後顧之憂，可以安心進行共同研究，爲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在質的提升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表 4　兩種學術期刊所登載的中國政治研究論文數量及韓語資料引用數一覽表（1991～2005）[10]

學術期刊 出版年度	《韓國政治學會報》		《國際政治論叢》	
	登載論文數量（篇）	韓語資料引用數（個）	登載論文數量（篇）	韓語資料引用數（個）
1991	0	0	2	0
1992	2	0	1	0
1993	0	0	1	0
1994	3	0	1	0
1995	5	0	1	0
1996	5	1	1	0
1997	2	1	2	2
1998	2	4	5	1
1999	4	3	4	2
2000	4	10	5	4
2001	5	8	6	9
2002	2	1	6	10
2003	3	4	4	8
2004	2	6	8	3
2005	2	11	8	22

[10] 資料出自金道喜，“韓國的中國研究月，有所改動。“視角和論點”，《東亞研究》，第 50 輯，200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中國政治之研究方法層面

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方法，一般主要考察文獻資料的應用情況、論述結構情況、以及實地考察、訪問等方法的使用情況。

文獻資料應用是使用最多的一種方法。首先，我們就文獻資料的語種進行考察。如上表所示，我們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九〇年代的論文所參考的資料基本是中文；九〇年代後半期開始，韓語資料的引用數明顯上升，同時英語的引用數也開始上升，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開始有了不少中文、韓文、英文文獻同時出現在同一篇論文中的情況。不同語種資料的共同參考引用，不但開拓了作者的研究視野，而且也爲讀者提供了相關的研究線索。其次，這些年來註腳數量也呈明顯上升趨勢。根據鄭在浩等人的研究，“從 CQ 所登載的論文的情況來看，雖然每年平均每頁的註腳數有所不同，但是韓國的註腳數要遠遠多於 CQ 上的論文卻是事實”[11]。表 5 爲《中蘇研究》從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四年十年間關於中國政治外交方面的論文的頁平均註腳數情況。再次，參考資料的形式也突破了以往平面媒體資料這一單一形式，隨著網路的廣泛普及以及文獻資料庫的建立，電子資料和網路資料也開始被學者們廣泛使用。比起傳統的平面媒體資料來，電子資料和網路資料具有更加快捷的優勢，且更具有時事性，可以抓住所研究主題當前最新的發展動向。

第二，我們要關注的是有關中國政治的論文的論述結構問題。如前所述，比起英美圈的論文寫作規矩來，目前韓國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學者大都體現出理論不足的弱點來，表現在論文方面則是敍述型論文居多，而很少能在論文中展示出相關的理論根據來。這個問題是

[11] 鄭在浩等，“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再考察：以資料、方法論以及談論爲中心”，《國際政治論叢》，第 45 輯第 2 號，200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中蘇研究》刊載中國政治論文平均頁註腳數一覽表[12]

年　度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註腳數	1.9	2.6	1.9	2.4	2.0	2.3
年　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註腳數	2.3	2.1	2.1	2.1	2.1	

制約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進一步向前發展的一個重大局限性。具體來看，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論文採用的都是中文的翻譯文的形式，即，大量進行直接引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雖然開始出現了將原文與翻譯文同時列出的傾向，但是“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只能是自說自話而已，由於證明的過程只偏重自己的主張，不但邏輯性脆弱，而且難以引起更多學術爭論。”[13]

第三，實地考察或訪問形式的運用大量增加。

隨著韓中的正式建交，韓中兩國在各方面的交流都日益活躍化。除了政府間組織的友好交流活動外，民間團體的交流以及個人探訪、旅遊等也越來越多了。於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者而言，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則有了更爲便利的條件親自前往中國去進行調查訪問，查詢相關在韓國無法得到的資料。此外，很多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者還經常與中國的學者進行共同研究，籍中國學者在中國的便利條件，有時甚至可以拿到一些不對外公開的內部資料，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此外，如果韓國學者在中國找到的共同研究者具有與當地政府的良好關係時，還可以籍機進行一些必要的個人訪談等。在進行某些特

12　鄭在浩等，“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再考察：以資料、方法論以及談論爲中心”，《國際政治論叢》，第 45 輯第 2 號，2005 年。

13　鄭在浩等，“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再考察：以資料、方法論以及談論爲中心”，《國際政治論叢》，第 45 輯第 2 號，200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研究時，政府相關部門官員的訪談比起統計數位和其他內部資料來具有更加鮮活、準確、即時的效力，可以對研究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因此，可以說，大幅增加實地考察方式的應用無疑爲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者之研究品質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

肆、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存在的問題及爭論

從以上所示之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現狀來看，整體上，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但是與其他英美圈國家相比，其研究水準還相對略低。以下爲其中所暴露出來的一些爭議和問題。

一、中國政治研究的學科定位問題

韓國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始自朝鮮時代對於漢學的學習和研究，當時，作爲漢學中的一部分，中國傳統的孔孟思想、理學思想等一直是韓國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主題。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有一些對中國政治關心的學者開始了對中國的新研究，到八〇年代末，這批學者基本奠定了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基礎框架，此時的中國政治研究是作爲政治學的一個領域而展開的。

此後，隨著韓國國內對地域學的研究熱情上升，作爲韓國鄰邦的中國無論從地理位置上，還是從韓中關係上都是韓國必須予以重視的一個大國。九〇年代以後，韓國的“中國學”研究轟轟烈烈地展開。在九〇年代前半，基本上以中國政治研究爲主，之後，隨著兩國經濟關係的日益密切化，對中國經濟研究的重視漸漸開始浮現。總之，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研究處於一個學科定位不是非常清楚的時期，甚至連目前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自身對於自身的定位也沒有一個鮮明的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念，有的學者認爲自己只是政治學家，以中國政治爲研究方向，而有的學者則認定自己就是中國學專家。

其實，作爲政治學的一部分的定位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作爲“中國學”的一部分似乎也有其道理。目前的問題在於，韓國所謂“中國學”本身並未公認是獨立的一門學科。儘管目前很多大學裏都起名爲“中國學系”，但是究竟何爲中國學至今仍然還沒有定論。因此，在其下進行研究的中國政治領域的定位依舊處於模糊狀態。

二、缺乏獨特的韓國的研究視角

如前所述，奠定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整體局面的是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學者們。之後，九〇年代從美國留學歸來的第三代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們繼承了第一代學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這樣的背景自然就決定了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很長時間以來基本上都是在沿襲美國的研究路徑，或者說就是在重複美國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美國學術研究視角和方法支配著韓國的中國研究學界，由此使通過美國的立場和觀點來理解中國的研究習慣普遍化。”[14] 再加上少數在臺灣取得學位的學者們又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臺灣的研究視角，所以，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存在一個重大弱點，就是沒有自己的、站在韓國人立場上的研究視角，這成爲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

由於地理及文化的巨大差異，從美國人的視角下來看待的中國政治理念、政治發展、以及政治變化等，自然與和中國一樣共同受到儒家思想浸潤的韓國人所看到的中國政治狀況會有所不同。此外，由於地緣的接近性和歷史上的長久往來，韓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政治也自然

14 박병석，“美國的中國研究趨勢和研究方法：論韓國存在的問題”，《東北亞區域發展研究》，1998 年第 12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和中國遠隔大洋的美國人所理解的有所差異。但是，目前韓國對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學界幾乎還處在模仿美國研究的階段上，這就勢必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研究與實際的脫節現象。

此外，當年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學者們所繼承學習來的一些美國學界存在的錯誤觀點等，也在韓國原版照搬地傳播了出去。這點尤其應該成爲當前韓國進行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們努力去改正的問題。

近些年來，中國政治的改革日新月異，已經遠遠超出了以前傳統社會主義的框架，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形式。這種形式既不同於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所執行的政治原則，又不同於資本主義政治觀念，這點一直是國際社會包括韓國在內的學者們所感興趣的一點。對於這種現象，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們應該首先承認中國的新變化，從中國本身的體制以及發展變化中去考察，而不是站在相對的立場上去一味批判。而且，鑒於韓中之間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極爲密切的關係，更應探索出一條新的研究中國政治的路來。

三、跨學科的共同研究有名無實

跨學科的共同研究本來是隨著各個學科的發展和很多邊緣學科的出現而必然出現的一種新研究趨勢。目前在韓國雖然存在共同研究的課題，但事實上沒有共同研究的過程和結果。目前在韓國所謂的共同研究，與其說是不同學科相互補充、相互結合的共同研究（即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倒不如說是一種不同學科自說自話的“雜和型研究”（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不同學科間在共同的研究課題上展現的完全是一種割裂的狀態與雜和的方式。目前的現實情況是：研究者爲了獲得財務上的支持而以共同研究的形式申報課題，但實際上卻沒有共同研究。

這種現象的出現不得不讓我們思考，到底什麼才是學科間的共同研究，以及爲什麼會出現這種雜和型研究等問題。所謂學科間的共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是指不同學科在研究中從不同學科的視角下相互補充的研究。造成韓國共同研究有名無實的原因與韓國國內學術界整體的學術研究氛圍有很大關係。目前在韓國，同行之間的交流不能說不多，名目繁多的各種學會也在定期舉行，但是在本應是進行學術交流、學術討論、甚至學術爭議的學會、探討會上，真正的批判性討論幾乎沒有，反而很多學者將學會、研討會等作爲鞏固和拓展自己圈子的良好機會而進行社交活動。這樣學會、研討會就失去了本來應該有的意義。這一問題不僅是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界的問題，也是整體韓國學界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

此外，韓國素有重視地緣、學緣、前後輩關係的傳統，這一點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界中同樣表現得非常明顯。同一學校畢業的學者自然就會形成自己的圈子，因而學者無法對自己圈子內部的觀點進行批判性研究。此外，學弟學妹對於學長學姐的學術觀點也基本不能進行批評，這樣在學緣、地緣等關係的影響下，韓國的批評、討論氣氛只能是有名無實，且學科間的共同研究也只能是不同觀點堆砌的結果。

四、研究資料與研究結果的共用問題

目前在韓國所進行的中國政治研究，無論是歸屬於政治學研究的分支，還是歸屬於區域學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在研究資料方面都還存在嚴重的分散性問題。除了公開的圖書館所藏有的書籍、論文等資料以外，其實不同的學者手中各自都收藏有不同的研究資料。這些資料基本都是研究者自己在研究過程中通過不同的方式以個人名義得到的，因此也就形成了只有自己可以利用的現實狀況。其他學者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又要花費大量的成本去獲得同樣的資料，造成了很多資源和人力、財力上的浪費。這與韓國在資源分享方面的制度有直接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研究成果在共用上也存在一些問題。目前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都是以論文的形式登載在學術期刊上、如果是大型研究課題的話，會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向社會公開發行。但是在選擇期刊上，很多學者都選擇登載在韓國學術振興財團指定的核心期刊上，其他期刊幾乎不予考慮。但是大部分學者在期刊上發表之前並不先在學會或研討會上宣讀，與同行進行進一步深層次的討論。這也是韓國討論氛圍的缺失所造成的。很多學者覺得沒有必要在學會或研討會上宣讀，因爲即使宣讀之後也無法進行真正的學術探討。由此，學會和學術研討會形同虛設，並沒有起到學術研究共用的作用。

伍、結論

作爲政治學，尤其是國際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中國政治研究在韓國無疑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作爲區域學中的一部分，從地理位置、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來看，中國都是與韓國密切相關的一個研究對象，而且在中國學研究中，中國政治研究又一直是研究的重點。但是，中國政治研究目前在韓國在定位上仍然處於一種尷尬的處境。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後，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無論從研究人員、研究環境、還是研究成果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其中同樣暴露出來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今後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們應該在以下方面進一步努力：

首先，韓國國內的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們從現在起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對目前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存在的問題進行進一步深入的思考。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克服這些阻礙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問題？作爲一名中國政治研究者，我自身應該起到怎樣的作用、怎樣爲改善這些問題做出自己的貢獻？

其次，關於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組織性問題。在政治學的領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國內目前雖然存在“韓國政治學會”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兩個組織，但是其中中國政治研究者們非常渙散，很少進行學術交流和討論等，缺乏組織性。同時，進行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也同樣缺乏集體歸屬感。因此，今後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們應首先從這方面著手，建立一個共同的交流、發表、討論的組織，以便進一步促進研究的發展。

再次，鑒於資料搜集等方面的成本浪費問題，可以考慮由什麼部門牽頭，創立一種資料共用的新途徑。創立專門的中國政治研究圖書館似乎實現的難度太大，但是發動現在正在進行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們列出自己目前已經擁有的相關資料名稱、版本、藏書數量等，進行整理、公佈不失爲一種比較有實現可能性的方法。如需要互通有無，學者之間可以進行私人性質的聯絡交流。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弄清楚目前韓國究竟藏有多少中國政治研究的相關資料，在整體上有一個把握，而且一些學者所藏有的一般人輕易得不到的內部資料等也可以實現更大程度的流通，有利於促進韓國中國政治研究的整體水準的提高。

由於韓國的文化背景，討論和學術批評等的缺失在韓國不是短期內可以可以克服的問題，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和改變才有可能實現。無論如何，目前韓國正在積極爲中國政治研究努力的學者們有必要進一步地思考和反省，以求找到更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創造更好的研究氛圍和研究環境，促進中國政治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單行本

曺淮煥等，《現代中國國情研究》，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校出版部，2000。

이건일，『중국정치：주제와 이해』서울：다다미디어，2005。

（李健一，《中國政治：主題與理解》，首爾：dadamedia，2005。）

이계희，『중국정치학과 중국정치』，서울：도서출판 풀빛，2002。

（李啓熙，《中國政治學與中國政治》，首爾：草色出版社，2002。）

정재호등，『중국정치연구론：영역，쟁점，방법 및 교류』，서울：나남출판，2000。

（鄭在浩等，《中國政治研究論：領域、爭論點、方法以及交流》，首爾：NANAM 出版社，2000。）

二、期刊論文

김도희，「한국의 중국연구：시각과 쟁점」，『東亞研究』，第 50 輯，2006 年 2 月。

（金道喜，“韓國的中國研究：視角和論點”，《東亞研究》，第 50 輯，2006 年 2 月。）

김영진，「중국정치연구의 정체성에관한 시론」，『국제지역연구』，2003 년 1 월。

（김영진，“試論中國政治研究的定位問題”，《國際區域研究》，2003 年 1 月。）

박병석，「미국의 중국연구 추세와 접근법：한국의 문제점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아울러 논함」，『동북아지역발전연구』，1998 년 12。
（박병석，“美國的中國研究趨勢和研究方法：論韓國存在的問題”，《東北亞區域發展研究》，1998 年第 12 期。）
임규섭，「한국의 중국연구 어제와 오늘-중국연구자의 고민과 반성-」，『아태연구』，제 14 권 제 2 호，2007 년 11 월 30 일。
（임규섭，“韓國的中國研究的昨天和今天 — 中國研究者的苦悶和反省”，《亞太研究》，第 14 卷，第 2 號，2007 年 11 月 30 日。）
전성흥，「한국의 중국 연구 발전 전망과 『중소연구』의 역할」，『중소연구』，통권 100 호，2003 / 2004。
（全聖興，“韓國的中國研究之發展展望及〈中蘇研究〉的作用”，《中蘇研究》，第 100 號，2003 / 2004。）
장현근，「중국정치사상에 대한 중국 내 연구동향」，『동양정치사상사』，제 3 권 1 호，2004 년 3 월。
（장현근，“中國國內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動向”，《東洋政治思想史》，第 3 卷 1 號，2004 年 3 月。）
정우광，「韓國에서 中國學의 現況과 그 方向」，『中國語文論叢』第 21 辑。
（鄭雨光，“韓國的中國學現況和方向”，《中國語文論叢》，第 21 輯。）
정재호 등，「한국에서의 중국정치 연구의 재 고찰：자료，방법론 및 담론을 중심으로」，『國際政治論叢』，제 45 집 2 호，2005。
（鄭在浩等，“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再考察：以資料、方法論以及談論爲中心”，《國際政治論叢》，第 45 輯第 2 號，200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Study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in Korea

Jae-Kwang Lee

Abstract

The study methods of literatures examination and comparison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in Korea.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in Korea, the panorama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in Korea is drawn out from four aspects, i.e. research groups, research environm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re also exist som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such as the problem of how to define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in Korea, the absence of Korean study aspect, the problem of the titular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this field,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ferences shall.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researchers who do the study about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in Korea should keep clear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do some improvement firstly from the points which can be made into reality easily, so as to do more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in Korea. For example, they can struggle from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eferences shall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etc.

Keywords: Korea, Chinese Political Study,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